

就在我修完博士班的時候，美國海軍醫學研究院出現了一個人，口口聲聲指著我，說我是當時外國、包括台灣的人才外流的好例子，而他本人絕不願意成為人才外流的一部份動力。這個人就是海軍上校薩達斯(Captain Sudduth)。我要問讀者，有誰到彼邦求學而不會想過要衣錦而歸？薩達斯上校從不瞭解這一點。我爲了找新的工作曾經到過波士頓及底特律等地覓職。

喬大的微生物學科怎麼會知道我在找工作的事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有這麼一天，喬大微生物學科的主任羅伯·巴勒(Robert Parlett)打了電話來說，羅賓斯教授準備前赴日本用掉她七年一次的休假，並爲準備退休後的規畫前赴日本鋪路，這段空窗期沒人教病毒學，要我來代課一年。這明顯地可以除去我必須立刻找到新工作的壓力，所以我立即答應說好。我把這事告訴內人惠美，那時岫清

六歲，雙胞胎女兒岫安和岫寧是一歲，她們當然還小，不知道家庭危機，但內人則冷靜地表示贊同。

這是我回母校工作的初因，但本來答應一年的工作，卻變成了二十年的「長期工作」（Long Stay）。

我在喬大一年間，發現學生不歡迎羅賓斯的課，急著另找教授。我雖然知道自己會變成好老師，但也沒料到我在英文還不太好時，會受到這種程度的歡迎。我分析原因，主要是我知道怎麼革新，知道怎樣給學生刺激而有學習的感覺，舉幾個例子說：

- 一、我從不立即回答學生舉手發問的問題，而先指定其他學生回答問題。
- 二、我會在講課中故意停講問學生的意見。

三、我開發了一堂新的課，稱為「臨床病毒學」，這個課也成了我一九七七年回台大客座時授課的骨幹。

四、我會利用我的檔案系統，避免下一年犯同樣的錯誤，例如一九七七年的檔案叫「一九七年的錯誤」，我會在一九七八年時拿出來看看自己在一九七七年犯了什麼錯誤。

——陳定信院士與聞玉梅——

學生很能領略我的教學努力，要記得全世界的每個學生都有一對雪亮的眼睛，曾經有一位同學敘述性地講盡了我是好老師的理由，他說：「當這個老師講課時，時間太過易逝，當這個老師講課時，絕不能睡覺，因為你不知道何時他會把問題轉向你！」

我還在美國時（一九八〇年），陳定信院士曾經來過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（N H I）培西爾博士（Dr. Purcell）的研究室，我事先知道他要來，就像已去世的哥頓教授一樣，準備了一套家具借給他，他只要找個住宿之處即可。

他自己的研究及去處是解決了，但他夫人的去處未定，於是她決定來喬大，到我的研究室做博士班學生一年。就這樣一年過去後，陳院士和夫人就回台北去了。

這時已有成大醫學中心的事甚囂塵上，一九八一年陳院士離美，接著從上海來了聞玉梅教授。聞教授的叔叔是大陸的社會學家、詩人，後來被國民黨暗殺的聞一多。她後來到倫敦的豪爾博士